

也门胡塞武装在国家重构中的角色及影响^{*}

苏 瑛 任 华

[内容提要] 也门胡塞武装的产生和发展不只是什叶派的栽德派在政治社会生活中边缘化时寻求复兴的直接结果,更折射出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中的国家世俗化与政治伊斯兰运动、国家加强控制力与部落自治传统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伴随胡塞武装强势夺权,其对国家重构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既改变了也门逊尼派主导政治权力的格局,还进一步削弱合法政府的控制力,在更大程度上主导着国家重构和地区安全形势。但是,也门国家政治重构将会持续一个较长时期,即便是胡塞武装与总统委员会作出实现也门内部长久和平的承诺后,也门政治和解依然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 也门 胡塞武装 什叶派 栽德派 民族国家重构

[作者介绍] 苏瑛,石河子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也门国家历史、政治与文化;任华,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周边外交。

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也门胡塞武装以“支持巴勒斯坦”为由袭击红海水域与以色列有关联的船只。商船频繁遇袭迫使多家国际航运企业暂停红海航线,引发国际社会对全球航运安全的普遍担忧。2023年12月19日,美国宣布组建代号为“繁荣卫士”的国际护航联盟。2024年1月12日以来,美英连续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Sana'a)、萨达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东现代民族和国家构建的多维比较研究(多卷本)”(20&ZD240)的阶段性成果。

(Sa'dah)、宰马尔 (Dhamar) 和荷台达 (Hudaydah) 等多个城市发动空袭。胡塞武装表示, 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对加沙的攻击, 其组织会进一步“升级行动”。2024年1月17日, 也门胡塞武装被美国政府重新列为“特别认定全球恐怖分子”实体, 导致国际社会关于胡塞武装身份属性的争议升温。“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抵抗联盟”的成员和“叛乱武装组织”等标签折射出胡塞武装的多重身份属性。从宗教思想的源流看, 胡塞武装是属于传统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栽德派 (Zaydis) 回应萨拉菲派 (Salafism) 挑战的产物; 从政治体系的角度, 胡塞武装是萨达地区谋求政治利益与政府边缘化政策激化矛盾的结果; 从地区局势看, 胡塞武装更被视为地区大国沙特和伊朗竞争的产物。^①本文拟全面系统地梳理胡塞武装的历史演进和角色变迁, 探索其在也门民族国家重构中的影响或作用。

一、也门胡塞武装在国家重构中的崛起

也门胡塞武装的发展贯穿国家统一后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全过程。该组织的崛起和演变既是栽德派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边缘化时寻求复兴的直接结果, 更是也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中深层结构性矛盾的集中反映。

(一) 也门胡塞武装的源起: 栽德派宗教复兴运动。胡塞武装的发源地萨达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西北240公里处, 不仅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栽德派聚居中心, 也是在也门维持近1000年统治的栽德派伊玛目国家政治中心。1962年北也门共和国建立后, 栽德派思想在国家意识形态中丧失主导地位。同时, 在也门发展迅速的伊斯兰教逊尼派中的萨拉菲派向民众输出挑战栽德派核心教义的意识形态, 进一步威胁栽德派思想的权威性。

^① Juneau T, “Iran's Policy towards the Houthis in Yemen: A Limited Return on a Modest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2, No.3, 2016, pp.647-663.

为了推动栽德派宗教认同的恢复与传承,20世纪90年代,以“青年信仰者”(Believing Youth)为主体的栽德派宗教复兴运动兴起,为胡塞武装的兴起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第一,栽德派宗教复兴运动中的教育活动为胡塞武装培养了大批支持者。在栽德派的复兴运动中,“青年信仰者”组织表现活跃。“青年信仰者”主要以夏令营的方式举办研习班,一边学习栽德派宗教知识,一边开展文体和研学活动,旨在增加栽德派青年的认同感。夏令营主张吸收不同部落与社会阶层的学员加入,萨达地区各部落领袖纷纷将本部落年轻人送入研习班。第一届夏令营1994年在萨达北部著名的哈希姆家族领地哈玛扎特(Hamazat)开营,吸引了当地凯赫兰(Khawlan bin Amr)和巴基勒(Hamdan Bakil)部落联盟中的青年参加,1991—1994年有来自省内外10000—15000名学生参加夏令营。此后,在哈贾(Hajja)、阿姆兰(Amran)、伊卜(Ibb)和塔伊兹(Taizz)各省的省会都开办了这类夏令营。^①为了对抗萨拉菲派的各类教育机构,以穆罕默德·叶海亚·萨利姆·伊赞(Muhammad Yahya Salem Izzan,简称伊赞)为代表的非哈希姆家族栽德派学者在萨达、焦夫和萨那等地重新开放了共和国初期政府关闭的栽德派学校。伊赞在栽德派富商的资金支持下组建了科学学院,在萨达地区中学、师范学校中开设由传统栽德派教师讲授的课程。此外,栽德派学者们出版宗教典籍并举办宗教讲座,宣传栽德派宗教传统。各类教育活动推动了也门栽德派宗教认同的恢复与传承,强化了栽德派青年的身份归属感。栽德宗教复兴运动实现了栽德派宗教精英与当地青年之间的良性互动,为之后胡塞武装培养起坚定的青年支持者。

第二,胡塞家族在栽德宗教复兴运动中的引领作用为其确立起在胡

^① D. Ahmad Muhammad al-Dughshi, “al-Zahira al-Huthiya: Dirasa Manhajiya fi Tab ‘iyat al-Nash’ a wa Jadaliyat al- ‘Allaqa bi-l-Ta’ rikh,” Nashwan News, April 20, 2009; Bernard Haykel, “A Zaydi Revival?” *Yemen Update*, No.36, Spring/Winter 1995, p.21.

塞武装中的领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胡塞家族当代领导人巴德尔丁·胡塞(Baddredin al-Houthi)撰写的《解放思想》等一系列著作和文章在萨达地区广为传播,鼓励栽德派青年主动投身宗教学术和教育活动。巴德尔丁的儿子们都参与过“青年信仰者”的工作,其中侯赛因(Hussein)、叶海亚(Yahya)、哈米德(Hamed)和穆罕默德(Muhammed)先后在科学学院学习,学成后均进入栽德派学校担任教师,主持重编栽德派的教材、出版栽德派书籍和各类宣传册。1993—1997年“青年信仰者”组织的工作多由穆罕默德·胡塞负责。穆罕默德将学生分成多个非正式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开展课后学习、文体和考察活动,吸引了萨达省内外的学生加入。1997年后,侯赛因·胡塞开始主导“青年信仰者”的话语权,胡塞家族日益在栽德派复兴运动的教育活动中发挥引领作用,其家族声望不断提升。

此外,胡塞家族的血缘关系和庞大社会网络使其具备了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巴德尔丁先后有四任妻子,其中三位来自萨达地区非常有声望的部落酋长家族和圣裔家族,第四任妻子来自栽德派宗教学者家庭。巴德尔丁的儿子们也分别同当地部落酋长家族联姻。通过联姻、拉拢手段,胡塞家族在萨达省内建立了以部落为基础的利益网络,为家族成员长期掌握栽德复兴运动的领导权奠定了社会基础。

(二) 也门胡塞武装向叛乱武装组织的蜕变。20世纪90年代末,“青年信仰者”各类活动和胡塞家族影响力的上升使萨利赫(Ali Abdullah Saleh)政府对其态度转为限制,同时栽德宗教复兴运动也引起政府内部逊尼派部落势力的反对。在此压力下,由于侯赛因·胡塞的主导,“青年信仰者”从温和的宗教教育活动的组织蜕变为地区叛乱武装组织。

第一,侯赛因·胡塞的保守宗教思想促成了胡塞武装的反政府立场。1997年开始,政府的打压使得“青年信仰者”的社会活动明显减少,但抗争情绪却在不断上升。受此影响,“青年信仰者”内部出现分化,以伊赞为代

表的温和派坚持采取宗教教育活动的温和方式，推动栽德派的复兴；而以侯赛因为代表的保守派主张以组建武装力量的强硬方式对抗政府的打压行动。此后，保守派与温和派渐行渐远，伊赞接受了萨达市政局的工作；侯赛因提出效仿伊朗建立“神权也门”，实行政教合一，建立伊斯兰国家。2001、2003年，美国以反恐名义先后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侯赛因借助国内广泛的反美情绪进行社会动员，并将栽德派宗教复兴运动与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相结合，呼吁穆斯林联合起来对抗西方霸权主义及与西方合作的阿拉伯国家统治者。2002年侯赛因发表演讲都以“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胜利属于伊斯兰”的口号作为结束语，这句话之后成为胡塞武装的口号并延续至今。侯赛因批评萨利赫政府对美国反恐政策的支持是对伊斯兰世界的背叛，萨利赫政府在寻求和解无果后，将胡塞家族及其支持者称为伊朗支持下的极端什叶派，其支持者的抗议活动被定性为企图颠覆国家政权的地区叛乱。^①2004年侯赛因领导的“青年信仰者”支持者与政府军爆发数次大规模冲突，造成数千人丧生，侯赛因本人也在一次军事行动中被也门政府军击毙。为了表示对侯赛因的纪念与忠诚，“青年信仰者”更名为“胡塞人”（Houthi），即胡塞武装。胡塞武装包含具有栽德意义的政治反抗文化，由此开启寻求萨达自治的政治抗争，并以反政府的武装行动不断冲击着国家政治秩序。

第二，胡塞武装的社会支持力量因萨达战争而壮大。面对萨利赫政府的强力镇压和一味指控，胡塞武装以自卫为旗号，在2004—2009年间与政府军爆发了六轮萨达战争。前三轮萨达战争期间（2004—2007年），也门政府主要行动是定点清除胡塞家族成员，并大规模逮捕其支持者，胡塞武装则以伏击和暗杀等方式进行对抗，但冲突烈度总体上较低。2007年第四次

^① Ayman Hamidi, “Inscriptions of Violence in Northern Yemen: Haunting Histories, Unstable Moral Spaces,”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5, No. 2, 2009, p.170.

战争冲突烈度最高，政府军实行“焦土政策”，不遗余力地对胡塞武装所有可能的据点进行轰炸，造成3000多人死亡，但未能瓦解胡塞武装的领导层或摧毁其社会基础，反而因对平民区的破坏而加剧了当地部落和民众的不满。一位全国人民大会党（CPC）官员表示：“胡塞的支持者日增，原因除了宗教的因素外，还有当地民众感到受歧视并被排除在发展政策之外，城镇的毁损则加深了这一印象。”^①地区战争并没有摧毁胡塞武装，反而激起更多人对胡塞武装的支持。

同时，持续六年的战争使胡塞武装完成了从松散的开展宗教文化运动的组织到强大的准军事实体的蜕变，每一轮战争都给胡塞武装带来获取更多武器、装备和实战的机会。2009年实施灵活游击战的胡塞武装缴获政府军一个连的所有武器和弹药。^②胡塞武装还通过拉拢或胁迫等手段获取部落武器库存，成为在山区和部落组织中能够实现动员和战斗的实体组织。这些战争使胡塞武装积累了实战经验，军事装备也日益丰富；同时强化了胡塞武装成员共同的战争记忆，借外部压力维持了组织的凝聚力，客观上实现了胡塞武装作为反政府武装的组织和形象重塑。

（三）也门胡塞武装的政治崛起：民族国家重构中的主导政治力量。2011年1月，受“阿拉伯之春”的影响，也门国内出现反政府游行。2012年初萨利赫总统被迫交权，继任的哈迪（Abdrabuh Mansur Hadi）过渡政府无法平衡国内各方政治力量。也门国内政局的持续动荡为胡塞武装扩大势力范围、走向国家政治舞台的中心提供了机会。反政府形象使其在2011年后从地区叛乱武装组织蜕变为也门国家重构中的合法政治力量。

第一，也门政局动荡为胡塞武装的身份转变提供了契机。2011年1月，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Abdul Malik Houthi）宣布其成员和支持

① *Yemen: Defusing the Saada Time Bomb*,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May 27, 2009, p.13.

② Barak A. Salmoni, Bryce Loidolt, and Madeleine Wells, *Regime and Periphery in Northern Yemen: The Huthi Phenomenon*, Rand Corporation, 2010, p.198.

者加入北部的抗议游行队伍。胡塞武装对民众抗议活动的支持使其在萨达以外地区的影响显著扩大。胡塞武装利用萨利赫政府遭遇国内抗议活动的机会,迅速驱逐萨达市原政府官员,单方面宣布萨达省独立。同年7—11月,胡塞武装先后控制焦夫省、哈杰省,打通了出海口,对首都萨那造成直接威胁。萨利赫下台后,根据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GCC)调解协议,2013年3月18日也门召开“全国对话会议”(NDC)。在包容性的政治气氛中,国内各方政治势力眼中的武装叛乱组织——胡塞武装受邀参会。这是胡塞武装第一次以公开、平等和合法的身份参与国家建设和发展方面的讨论。2013年9月底,新成立的也门临时政府就过去的一些错误做法向胡塞武装和南方代表致歉。^①在也门政治过渡时期,胡塞武装转变为民族国家重构中的合法政治力量,进而提出多项要求,如在哈迪政府中获取更多权力、改变裁德派长期在政治经济领域边缘化的局面、将战斗人员编入国家军队等,但都没有得到满足,因而在全国对话会议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很有限。

第二,也门胡塞武装强势夺权并领导应对内战,迅速崛起为国家重构中的主导性政治力量。2014年,为了寻求发挥更大的政治影响力,胡塞武装选择与前总统萨利赫结盟。当年9月,哈迪政府削减燃油补贴的决定引发民众强烈抵制,胡塞武装以对抗腐败政权为由举兵南下夺取首都萨那,迫使哈迪同意组建联合政府。2015年2月,因为不满哈迪政府宪法草案中的联邦州划分,胡塞武装软禁哈迪和多名内阁部长,后哈迪被迫辞职流亡沙特。胡塞武装随即宣布解散议会,成立由151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3月,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军事行动,内战爆发。内战期间,胡塞武装强势南下,与阿拉伯联军、政府军、伊斯兰改革集团(Islah Party)、“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AQAP)及南部部落势力多线作战,先后夺取塔伊兹、亚

^① Stephen Steinbeiser, “No Peace without Justice: The Arab Spring, the National Dialogue, and Yemen’s Descent into Chaos,” *Chroniques Yéménites*, January 12, 2015, <http://cy.revues.org/2866#tocfrom1n2>.

丁(Aden)。2016年初,在联军支持下,政府军夺回亚丁和塔伊兹,在荷台达一带形成对峙局面,但胡塞武装事实上已经掌控也门北部大部分地区。2022年4月7日,哈迪总统宣布辞职,将权力移交给由8人组成的总统领导委员会。2023年底,胡塞武装与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一致承诺在全国范围内停火,再加上红海局势升级,胡塞武装已然掌握了也门国家重构的主导权,甚至在也门与沙特、伊朗以及美国各方关系中不时占有主动。

在也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解构与重构中,胡塞武装经历了从反叛者、参与者到主导者的角色转换,其政治诉求也从寻求萨达地区自治转向获取中央权力。这一历史现象是萨达地区传统部落社会面对现代国家构建而导致生存空间受到挤压的必然反应,折射出萨利赫主导的国家构建走向失败的现实。胡塞武装的崛起历程、意识形态显然是也门国家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并且不可避免地也对也门国家重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也门胡塞武装对国家重构的影响

也门胡塞武装的崛起对国家内政外交均产生重要影响,其军事行动导致国内政治力量间对抗加剧,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权力格局和政治生态;其意识形态对现代民族国家的世俗化方向构成挑战,并给地区安全增加变数。

(一) 也门胡塞武装的崛起改变了逊尼派主导的政治权力格局。20世纪60年代北也门共和国(YAR)建立后,裁德派丧失在国家意识形态和权力机构中的核心地位。以哈希德部落联盟(Hashid)为代表的西北高原逊尼派政治精英集团与萨利赫总统结盟,牢牢掌控着国家政治权力。1987年北也门最后一届政府内阁中,有18位部长来自萨那和西北高原地区,只有7位

部长来自西北高原之外地区。^①1990年5月北南也门统一后,1993年议会选举中全国人民大会党获得的绝大多数选票仍来自西北高原地区,1994年内战后萨利赫及全国人民大会党大权独揽,影响力较大的政党伊斯兰改革集团也属于逊尼派政治力量。2012年继任的哈迪政府对也门军队中萨利赫家族势力进行清除,但其政府成员仍以全国人民大会党等传统逊尼派和西北高原部落势力为主。萨达战争时期,政府军在人数和装备占据优势的情况下,未能瓦解胡塞武装的领导和组织,反而使胡塞武装以自卫战争和圣战的名义在当地赢得广泛支持。这暴露出萨利赫政府对萨达地区实际控制能力的虚弱,传统部落调解方式未能阻止冲突的频繁发生显示出政府管治的乏力。萨达战争加速了国内反政府力量的联合,间接推动了萨利赫威权政体走向崩溃。2014年胡塞武装的强势夺权行为从根本上改变了逊尼派主导国家权力的政治格局。胡塞武装与哈希德部落联盟大艾哈迈尔 (Al-Ahmar) 家族控制的伊斯兰改革集团所属武装力量在阿姆兰省奥萨马特 (al-Osaimat) 地区爆发流血冲突,大酋长阿卜杜拉·本·侯赛因·艾哈迈尔 (Abdulla Ben. Hussein Al-Ahmar) 的住所被炸毁,其家族被迫迁出阿姆兰省。之后,胡塞武装进入也门中、南部各省,并多次与当地逊尼派部落武装和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发生交火。2015年以来胡塞武装不断推进的军事行动加剧了政局动荡,南方分离主义运动 (al-Hirak)、极端主义组织、部落势力纷纷乘机扩大势力范围,试图乱中取利,也门国家长期由逊尼派主导的政治生态被撕裂,政治力量碎片化,导致政治和解困难重重、一波三折。

(二) 也门胡塞武装的意识形态对现代国家的政治理念构成挑战。20世纪60年代后,也门现代国家一直坚持民主化与世俗化的发展方向,建设世俗政体而非实行政教合一。统一后,萨利赫坚持世俗主义政府体制,排斥

^① Stephen W. Day, *Regionalism and Rebellion in Yemen: A Troubled National Un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65.

宗教政治化与政治宗教化。虽然存在伊斯兰改革集团这样宗教色彩浓厚的伊斯兰政党,但政府在宗教与政治关系上始终坚持宪政民主制度,国内宗教信徒虽然分为什叶派分支栽德派与逊尼派,但两大派之间一直并无严重的冲突。

在栽德派宗教复兴运动背景下成长的侯赛因·胡塞自幼接受传统的栽德派宗教教育,1999—2000年期间赴苏丹首都喀土穆(苏丹是当时政治伊斯兰运动最为活跃的国家之一)学习,此后又去伊朗学习,接触了伊斯兰革命的许多理念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政治思想。^①侯赛因认为:穆斯林世界与美国、以色列应该是对抗的关系,需要团结起来共同反对美国和以色列;效仿伊朗建立伊斯兰神权共和国,宗教与国家不可分割。侯赛因的思想不同于传统的栽德派思想,他主张完全按照宗教经典《古兰经》的解释和圣裔家族的领导建立理想的穆斯林世界秩序。侯赛因否认恢复伊玛目制度,但强调应该在共和制中存在一个来自圣裔家族的最高领袖,该领袖既不是具有行政属性的伊玛目,也不是传统的教法学家。^②侯赛因的政治思想具有保守的原教旨主义色彩,但表现出与传统栽德派政治观点的决裂。这一政治思想决定了胡塞武装意识形态的激进性与简单化特点:在行动上以强烈反美反以的口号实现社会动员;以侯赛因本人的殉道形象和圣战作为象征符号,唤起支持者为宗教而战的光荣使命感,对国家重构中民主化、世俗化的发展方向构成严峻挑战。

(三) 也门胡塞武装的区域管治进一步削弱合法政府的控制力。2014年年底,胡塞武装占领首都萨那后的自我定位是具备主导能力的准国家行为体,并对其控制区实行准国家式管治,从而逐步消解合法政府的国家治

^① Michael Knights et al., "The Houthi Jihad Council: Command and Control in 'the Other Hezbollah'," *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at West Point*, Vol.15, Issue 10, 2022, p.3.

^② Abdullah Hamidaddin, *The Huthi Movement In Yemen, Ideology, Ambition and Security in the Arab Gulf*, I.B. Tauris, 2022, p.32.

理权。

第一，胡塞武装建立的地方管理体系消解了合法政府的控制力。2014年后，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及胡塞家族其他核心成员组成的忠诚网络是其控制区影子政府的核心。胡塞武装向控制区域内各省的省长办公室、行政办公室派驻“监督官员”（mushrifin）。省级监督员几乎全部来自与胡塞家族关系亲密的家族。在县级层面，县长出自全国人民大会党，监督员则为胡塞武装成员。省级监督员负责所有与战争密切相关的事务，包括兵员招募、石油天然气保障、军事检查站部署等。2017年后，胡塞武装控制区逐步实行以监督员替换当地官员。监督员能任意扣留公章、控制省级预算和收入、扶持忠于自己的官员，在县级、地区和省级掌握真正的权力。如2017年，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萨利赫·萨马德（Saleh al-Samad，2019年在沙特空袭中丧生）任命全国人民大会党成员穆罕默德·玛奇达什（Muhammad Al-Maqdashi）为宰马尔（Dhamar）省省长，就是博取当地支持的权宜之计。2019年6月，玛奇达什被迫辞职，他抱怨自己因为受到干扰性控制而无法履行职责，其职位很快被胡塞武装的穆罕默德（Muhammad al-Bukhayti）接任。^①2019年后，胡塞武装对地方的管理日益正规化和地方化，获得任命的各省省长、秘书长和县级官员大多就地产生，其中许多人都是新招募的胡塞武装成员。监督员不再独立于管理部门之外，而成为拥有实权的管理者。例如，在拉马赫（Raymah）和萨那，前总监督员被任命为省长，其他官员也经过正规化任命并有明确的职责范围。^②总体而言，平行的监督员系统正在从日常行政管理中退出，一度模糊不清的权责划分更加清晰。胡塞武装加强在关键职位上的控制力，但大多数省份的副职并没有变

① Mareike Transfeld, Maysaa Shuja al-Deen, and Raiman al-Hamdani, “Seizing the State: Ibb’s Security Arrangement after Ansarallah’s Takeover,” *Policy Report*, Yemen Polling Center, 2020, pp.10,13.

② Abdullah Hamidaddin, *The Huthi Movement In Yemen, Ideology, Ambition and Security in the Arab Gulf*, I. B. Tauris, 2022, pp.220-221.

动,以保证其与当地精英建立同盟的必要性。有计划的替换和新人招募是胡塞武装实施地方管理的主旨。越来越多的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加入胡塞武装。胡塞武装地方分支机构和党员发展、在关键机构中的存在、提供庇护的能力以及在整个控制区监管官员和民众行为的能力,日益超越此前执政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

第二,也门胡塞武装接管了合法政府的教育机构,使其成为服务自身的宣传工具。2015年胡塞武装接管了也门北部各省的教育部门和国家高等教育办公室,叶海亚·巴德尔丁·胡塞(Yahya Badr al-Din al-Huthi)执掌教育部。胡塞武装对控制区域内各地教育部门负责人的任命只以忠诚为标准,新任命的官员缺乏学历和经验,许多人只是高中毕业。2018年,胡塞武装在萨那就任命了36位校长。2019年,胡塞控制的教育部收回各省级管理中学校招聘和管理的权限。2019年,约有25万青少年参加了胡塞控制区3672个夏令营。侯赛因的《马拉济姆》(Malazim)演讲集是夏令营的核心教材。^①胡塞控制区学校每天都会播放一到两个小时胡塞领导人的演讲录音供学生学习。2014年之后,胡塞武装通过媒体和组织强制性的文化培训宣传其思想和教育理念,控制区内所有政府雇员必须接受专门的培训课程,培训时间一般为四周,培训内容以学习胡塞武装领导人的讲话为主,有数以万计的民众接受了此类培训。胡塞武装在教育领域的这类举措并不符合现代教育的规律和目标,而是服务于该组织的战争状态和政治目标,客观上保证控制重要的教育部门、压制学术自由,逐步替换控制区域内的学校教材,宣传裁德派和其领导人的政治理念,培养更多支持者。

胡塞武装以具体的政治措施逐步实现主导国家政治格局的野心,地方管理的正规化和注重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有利于巩固其实力地位、强化其

^① Abdullah Hamidaddin, *The Huthi Movement In Yemen, Ideology, Ambition and Security in the Arab Gulf*, I. B. Tauris, 2022, pp.121-122.

国内政治声望。尽管存在任人唯亲和强制性培训教育的行为，但大量宣传培训进一步压制了合法政府的声音；胡塞武装在内战中自称的国家捍卫者形象逐渐塑造起来，这一切增强了胡塞武装的政治影响力。

（四）也门胡塞武装借助宗教认同和恩惠政策实现了对部落力量格局的重组。部落社会构成也门社会的基本组织和单位，在国家发展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门开启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后，以部落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没有根本变化。胡塞武装崛起后的重要政治任务就是如何在松散且矛盾重重的社会实现动员、使部落势力为己所用。在被称为“部落之地”的萨达地区，胡塞家族成员借助引领栽德宗教复兴运动积累的声望、圣裔家族的出身以及当地部落进行家族联姻，从而构建起多个相互重叠利益的亲属网络，为之后胡塞武装在萨达地区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萨达战争期间，政府军的强势行径导致大量部落转向支持胡塞武装，背后也有栽德派宗教认同的因素。

对于西北高原地区部落，胡塞武装以传统恩惠政策及分化、拉拢的方式获取支持。胡塞武装与哈希德部落联盟大酋长艾哈迈尔家族势力对抗，削弱了以该家族为代表的西北高原地区部落长期把持也门政治的力量，打破了一家独大的传统部落格局。同时，胡塞武装以恩惠政策拉拢以巴基勒部落联盟为代表的部落势力。一是对于支持胡塞的部落酋长，在其领地外地区授予官职。任命部落酋长穆罕默德·麦格迪什 (Sheikh Muhammad Al-Maqdashi) 为宰马尔省 (Dhamar) 省长，阿卜杜勒·瓦希德·萨拉赫 (Abdul Wahed Salah) 为伊卜省省长，法尔希·希巴里 (Fares Habari) 为利玛省 (Raimah) 省长。二是与部落社会签订新的合作契约。2014年后胡塞武装与萨那周围多个部落签署了“部落荣誉协定”，其核心内容是剥夺反胡塞分子作为部落成员的社会权利，即将其态度视为个人行为，促使各部落之间相互制约。三是尊重部落社会规范和习俗，将胡塞武装塑造为部落一分

子和部落间调解人。胡塞武装派遣具有威望的调解者致力于解决部落间长期存在而国家司法无力解决的纠纷。如2014年控制哈希德部落地区后,胡塞武装指派的调解者成功解决了阿尼斯与哈希德部落联盟间长达数十年的复仇纠纷。^①对于拉拢不成功的敌对部落,胡塞武装则毫不留情地施以轰炸、绑架、没收财产、扣押人质等手段,削弱其力量。在也门南部沙布瓦(Shabwa)、拉赫季(Lahij)、贝达(Bayda)等省份,与胡塞武装作战的许多部落都有如此遭遇。总体上看,胡塞武装利用部落社会分裂和矛盾的现实,采取拉拢、打击的分化策略,促使部落力量格局重组,从而逐步实现控制。

也门胡塞武装的崛起加剧了国家政局动荡,同时引发什叶派的栽德派与萨拉菲派、基地组织分支等逊尼派教派间的冲突,加剧了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与分化、重组。其背后,还有沙特与伊朗两个区域大国对于地区领导权的争夺,两国的博弈贯穿胡塞武装发展壮大的全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也门内战即被视为沙特支持的合法政府与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之间的“代理人战争”,已经并将继续对也门及海湾地区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局势造成巨大冲击。

三、也门胡塞武装在国家重构中的未来走向

也门胡塞武装的发展和作用将会循着历史轨迹继续前行。未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实力无疑会增强,其在政治和解和国家重构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将会加强,在区域内部矛盾与大国博弈交织的背景下亦会对地区乃至世界的安全格局产生更大影响。

第一,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实力增强,政治能力将会更加灵活务实。从萨

^① [也门]艾哈迈德·塔拉斯·阿拉米:《胡塞武装组织—政治、部落以及宗派》,萨那战略研究中心,2019年9月2日, <https://sanaacenter.org/ar/publications-all/analysis-ar/8003>。

达战争中走出来的也门胡塞武装，最初是以火箭筒和步枪为主要武器的游击武装力量。经过近十年内战的淬炼，胡塞武装军事实力和作战能力上完全达到了正规军的水平。如今，胡塞武装拥有人数众多的陆军，还有一定规模的空军和海军以及地对地导弹部队。它的大部分重型武器缴自战场，自身也拥有部分军工生产能力。此外，在多年战争中，胡塞武装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训练出大量战斗人员。可以说，胡塞武装已成为一支拥有较强战斗力、完整组织架构和一定军工生产能力的组织，由此决定其政治话语权的不断增强。

胡塞武装借助务实灵活的政治能力和联盟策略，尽可能地争取到国内部落和其他政治派别的支持。胡塞武装主体成员既包括在政治乱局中乘机扩大势力范围的部落势力，也包括谋求栽德派复兴的传统宗教精英及其家族。这种构成的多样性有利于胡塞武装整合各派势力，但由此带来的利益多元化问题使该组织内部在重大问题上很难达成一致，最明显的例子是国际社会每一次艰难促成的停火协议总是因胡塞武装下级指挥官自杀式抗议而中止。^①同时，胡塞武装的领导层并非传统意义上等级分明的纵向结构，而是包含多元关系的社会网格状结构：各下级军事指挥官根据战争形势变化与自身利益自主行动；在武器和物资供需方面，大多实行按需采购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管理层自上而下的分配。这种组织运营模式能够化整为零，并且依托当地地理条件和部落力量，在军事行动中具有较强的灵活性。但是，随着胡塞武装控制区域的扩大，以忠诚誓言和亲属关系维系的组织结构亟待从社会网格状转向垂直化管理，进而实行一定程度的集权，以便更有效地约束各下级组织，实现高效管理，提高军事和政治战斗力。为此，胡塞武装需要进一步加强组织制度化建设、协调好各级组织的关系，真正实现

^① Marieke Brandt, *Tribes and Politics in Yemen: A History of the Houthi Conflic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234.

对各级武装力量和机构的节制能力,维持整体的团结与稳定。

第二,也门胡塞武装将会继续主导也门国家重构,在实现全面政治和解中发挥积极作用。当前,胡塞武装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包括首都萨那在内的北部领土,涉及宰马尔省、贝达省、伊卜省、利玛省、迈赫维特省和阿姆兰省,荷台达省大部分地区,并不断以治理者的姿态在萨那和控制区域各省建立其影子政府,开启对实控区的合法性建构。相对而言,总统领导委员会实力更弱,它虽然控制了也门北部的荒漠地区,但其控制区人口规模极其有限;在战场上,依靠阿拉伯联军的支持才勉强维持与胡塞武装势均力敌的局面;总统领导委员会的领导层甚至长期寄居在沙特,其实际控制力和权威性大打折扣。因此,在也门国家重构的进程中,也门政府无力承担主要责任和任务,胡塞武装的话语权、影响力日益增强。

也门胡塞武装在政治和解中的进取性和积极作用日益明显。2023年12月总统领导委员会作出承诺,将在全国范围内采取实际的停火措施,以实现也门长久和平,也门内战或将迈出国家重构的“重要一步”。^①2024年初,也门国内的停火协议已经落实,开始就多个问题制定路线图和执行计划。当然,这一政治和解进程仍然受制于国内政治势力的分裂和胡塞武装的意识形态。除了也门合法政府和胡塞武装之外,也门境内还有多个地方势力和武装组织,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是也门副总统祖贝迪(Aidarus al-Zubaidi)领导的南方过渡委员会(STC),它控制了也门南部广大地区特别是最大港口亚丁、沙布瓦省及周围地区的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国内各政治势力派系林立、关系复杂,各派利益难以统一;由于有伊朗支持的栽德派背景,胡塞武装长期面对国内逊尼派和共和政治力量的抵制;南方过渡委员会关于南方独立建国的政治目标日渐清晰。胡塞武装只有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提出更具

^① 《联合国特使欢迎也门朝着停火迈出重要一步》,2023年12月26日,联合国新闻网,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3/12/1125307>。

包容性的政治方案，与逊尼派政治力量达成共识，并正视南方过渡委员会的诉求，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政治和解。

胡塞武装一跃而为国家重构中的主导政治力量后，有意淡化其叛乱武装组织的身份色彩，着力于塑造国家捍卫者的政治形象。2019年，胡塞武装发布“国家愿景”文件，提出“伊斯兰教的原则和伊斯兰教法的戒律是建立现代也门国家的基础”“共和制度和遵守宪法与法律”“通过自由透明的选举和平移交权力，以及实现社会公正和平等公民权”等六项基本原则。^①该文件显示出胡塞武装以现代共和制度构建政治合法性的努力。但是，“国家愿景”并未落实在具体政治实践中，形同一纸空文。阿卜杜勒·马利克接受了侯赛因关于国家治理需要最高领袖的主张，继而希望通过非制度化的折中方案调和栽德派政治思想与共和制之间的关系。马利克如同国家元首一样在国家和宗教节日向全国发表讲话，但并不具有合法国家元首的身份。未来，胡塞武装需要不断作出战略调整，打破胡塞家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构建新的制度模式将置身于国家权力之外的“最高权力”融入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框架内，如此才有可能推动国家重构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三，随着红海局势的持续紧张，也门胡塞武装通过角色行为调整将会在地区事务中提升影响力。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地区的军事行动是为了配合和支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反以斗争，其军事行动呼应了伊朗为首之“抵抗联盟”（Axis of Resistance）的反美反以活动。当前加沙冲突持续无解，而胡塞武装作出策应后又导致红海危机。如此下去，胡塞武装将继续在红海和亚丁湾向以色列和美国目标发动袭击，美军与胡塞武装之间的交火还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也门胡塞武装与美国、以色列间的对抗将出现长期化趋势。

^① Supreme Political Council of the Republic of Yemen, “A Hand for Protection and a Hand for Building,” *National Vision For The Modern Yemeni State*, March 26, 2019, pp.20-21.

侯赛因·胡塞曾经借助反美反以的思想成功整合也门萨达地区各种反政府力量,直接推动胡塞武装的发展壮大。当前,也门胡塞武装将反美反以的意识形态升级为地缘博弈,对美英军事打击的不妥协态度在国内外赢得了广泛支持和称赞,巩固了其在也门政治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并强化了其作为重要国际行为体的形象。胡塞武装与美英的对抗升级进一步显示了其军事实力和政治能力,促使国际社会正视其作为重要政治力量的现实。这一切为胡塞武装在当下联合国主导的也门和平进程中赢得了更多的政治筹码和更大的话语权。此外,胡塞武装引发红海危机的行动强化了“抵抗联盟”的内在联系和外在呼应,其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获得显著提升。

结语

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理论为评估也门胡塞武装在国家重构中的角色和影响提供了分析视角。也门民族国家构建是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包括社会主义思想互动的结果。在一个部落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分裂型的社会传统和强烈的地域认同观造就了“强社会、弱国家”的权力分布模式和“冲突型”的政治文化。长期的分裂、频繁的内战构成国家历史发展的主线。也门前总统萨利赫能维持近34年的政局稳定,在于通过恩惠政策在威权政治体系内建立强大且多个利益重叠的赞助体系,借此构建的庇护关系网和对武装力量的掌控将社会中大部分碎片化力量团结在中央权力机构周围,即韦伯所说“国家是一种在一个给定范围领土内(成功地)垄断了武力合法使用权的人类共同体”。^①但是,萨利赫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模式造就了相对强大的总统、相对虚弱的国家和碎片化的社会力量,裁德派宗教复兴运动的出现折射出始终困扰也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国家世俗化与政治

^①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eds., *Max Weber*,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0, p.79.

伊斯兰运动、国家控制与部落自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蜕变为地区反叛组织的胡塞武装则以批评政府的亲美外交政策为突破口，对萨利赫构建的庇护关系网发起反抗，加速了萨利赫威权政体的崩溃。

由于胡塞武装的强势夺权，国际社会主导的也门国家政治过渡进程中断，内战爆发带来的中央权力消解和各派政治力量博弈增加了也门国家重构的变数。也门的冲突“是谁控制国家的斗争，而不是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冲突”。^①众多非国家行为体都在争夺对国家重建的主导权。长期碎片化的社会结构和冲突型的政治文化势必加剧政治和解中的社会冲突。未来，胡塞武装主导下的也门政治和解和国家重构进程要想顺利推进，有关各方必须秉持务实、包容性的政治态度，既尊重也门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政治传统，又积极应对社会矛盾和冲突，同时协调好地区相关国家立场。中国政府支持以“也门人主导、也门人所有”原则推进也门政治进程，这一立场符合也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也有助于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

（责任编辑：黄昭宇）

^① Maria-Louise Clausen, “Competing for Control over the State: The Case of Yemen,” *Small Wars & Insurgencies*, Vol. 29, No. 3, 2018, pp.560-578.

Abstracts

The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Trumpification of the US Republican Party

Diao Daming

Abstract:

The prominent performance of former US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in the 2024 presidential election circle reflects the ongoing developments of the Trumpification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Since Trump's departure from office, Trumpification has been manifested in the shaping of party ideology by the GOP political stance being dominated by Trump. In the realm of personal influence, Trumpification is manifested by the overall acceptance of GOP elites and voters towards Trump's presidential candidacy, notwithstanding a decrease in their satisfaction with him personally. Investigating the underlying reasons,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rumpification are intricately linked to Trump's influence on the party political ecology, such as the formation of a new GOP coalition and the reshaping of GOP elite composition. Additionally, these developments are also influenced by specific political developing factors, including the unique circumstances of the 2020 elections that led to Trump's "quasi-incumbent" status, and the economic and immigration issues in the 2024 elections that favor Trump. The role Trump plays in the 2024 election and its outcome will be critical junctures in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influence of Trumpification, especially Trump's personal influence, will persist or undergo changes.

Keywords:

US, party politics, Republican Party, Trumpification, 2024 US elections

The Role and Impact of Yemen's Houthis in State Rebuilding

Su Ying and Ren Hua

Abstract: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Houthis is not only a direct result of the revival of the Yemeni Zaydis in the face of the marginalization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but also a reflection of the two sets of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nation-state in Yemen, namely, the secularization of the state versus the political Islamic movement,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state control versus the tradition of tribal self-governance. Along with the Houthis' strong takeover of power, their influence on the country's restructuring is increasing, not only changing the Sunni-dominated political power structure in Yemen, but also further weakening the control of the legitimate government, dominating the direction of the country's restructuring and directly affecting regional security. The Houthis will continue to dominate the political restructuring of the country, and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to achieve political reconciliation in Yemen, following the commitments made with the Presidential Council to achieve lasting peace in the country.

Keywords:

Yemen, Houthis, Shiah, Zaydis, nation-state rebuilding

EU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Following the Ukraine Crisis and the Impacts

Fang Lexian and Wan Yujing

Abstract:

Since the Ukraine crisis broke out in February 2022, the EU has issued 12 packages of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In terms of its evolution, it has mainly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rapid escalation, highlighting restrictions in the energy sectors, and cracking down on